

主 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 明代史学思想卷

向燕南 著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

主 编 吴怀祺 副主编 汪高鑫 向燕南 周少川

○ 明代史学思想卷

向燕南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明代史学思想卷 / 向燕南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211-07810-3

I. ①中… II. ①向… III. ①史学思想—中国
②史学思想—中国—明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36920 号

中国史学思想会通·明代史学思想卷

ZHONGGUO SHIXUE SIXIANG HUITONG · MINGDAI SHIXUE SIXIANG JUAN

作 者: 向燕南

责任编辑: 郑翠云

特约编辑: 田成海

出版发行: 福建人民出版社

电 话: 0591-87533169(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印 刷: 福州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地 址: 福州市仓山区金山大道 618 号橘园洲工业园仓山园 19 号楼

开 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2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7810-3

定 价: 7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中国是个具有重史传统的国家，史学思想博大精深。纵观史学思想的内涵，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二是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对客观历史的认识是指历史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和思想家；对史学本身的认识是指史学观，其认识主体主要是史学家。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主要考察历史的变易过程，以及历史变易的动因；对史学本身的认识则主要包括对于历史理论、历史教育、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和历史文学观等的认识，以及对于史学价值论和史学社会功能的认识。

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并不是孤立进行的，史学思想的研究也必须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探讨史学思想，必须要与社会现实相联结，必须考察其与时代哲学思潮的关系，必须考察史学思想本身的渊源流变，必须考察史学思想各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史学与经学、玄学、理学、事功之学、经世之学、实学等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具有四部思维意识去进行史学思想的研究，重视探讨经史、子史、文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近代史学时，我们还要努力把握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与走向，关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近代史学与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

中国史学思想最鲜明的特色是会通精神，这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特

征。《周易》讲通变精神，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司马迁讲“通古今之变”，重视对于历史盛衰之理的探究；《通志·总序》说：“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突显了郑樵对历史与文化会通思考所具有的大视野。

近年来，以吴怀祺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本着会通精神，对中国史学思想史展开了长时段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发掘中华传统史学思想特性，思考传统史学思想的当代价值，展现中国史学优秀的民族精神，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两套大型系列学术著作的问世：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前者时间上跨越了从先秦时期到1949年的漫长历史，后者内容上涵盖了历史思维、经史关系、历史盛衰、历史文献学思想与历史编纂学思想等方面专题。

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是从纵向对中国史学思想展开的研究，而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则是从横向来专论中国史学思想的相关问题，这种多维研究恰恰体现了会通的思想与方法。从两套系列著作的整体布局来看，前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史的贯通研究，主要体现“通”的意识；后者作为对史学思想各类专题的研究，则主要彰显了“会”的思想。然而，这种“会”与“通”又是相互包含的，“会”中有“通”，“通”中有“会”。10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史》关于每一阶段史学思想的论述，既是中国史学思想通史的重要一环，又有对这一阶段史学思想多维度的探究，体现了“会”的意识；同样，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通论》虽然是专题式的研究，而其中每一专题的研究，又都是采取贯通的方法，重视溯源探流，重视发展过程，体现了“通”的意识。

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国史学思想通史》与《中国史学思想通论》所蕴含的会通思想，我们将两套大型学术著作合编在一起，以“中国史学思想会通”为总书名，进行再版。

这样做首先是满足弘扬中国传统史学、回应西方学人扭曲中国传统史学的需要。中国史学源远流长，史学思想丰富深邃。然而很多西方史家以傲慢的态度鄙薄中国史学，否定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如何回应？我们不能只是简单地去展示中国传统史学，而是要把历时性的研究和共

时性的研究结合起来，从理论的高度上，概括出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与要义，并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振兴中华文化的总目标出发，讨论传统史学如何走向世界，思考传统史学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其次是把握中国史学优良传统与时代性的需要。传统史学有很多精华需要我们去总结，如历史运动的通变观、天人相关的思想、见盛观衰思想、民为邦本与民贵君轻思想、传统历史编纂理论与方法论等。史学的时代性同样不可忽视。当前我们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把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讨论中国史学的进程，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趋势，讨论历史学科建设问题。

当然，合编与再版不是简单的重印，而是有内容的提升与结构的整合。从内容来讲，各卷作者对原有内容普遍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订和补充，有些卷补充的内容较多，有些卷调整了篇章。从结构来讲，原来两套书各自的总论部分，被整合成一卷新的《总论卷》，起到了对全书的统领作用。

16卷本《中国史学思想会通》大型学术著作的出版，既表达了学人们对于中国史学会通思想的继承，也充分体现了该书纵横论说中国史学思想的会通特点。传承历史文化，建设时代文化，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任务。我们希望这套著作的推出，有助于加强人们对于中国传统史学的认识，深入挖掘中华传统史学所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有助于学界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助于当前的文化传承与时代文化建设，树立文化自信，推动文化大发展。

2017年10月

题 记

吴怀祺

在元代卷《题记》中，我谈到明代前期与元代应作为一个时期看待，就是说，明代史学思想虽作为一卷，但明前期与后期差别很大。

关于明代的学术，皮锡瑞有一句话：“论宋、元、明三朝之经学，元不及宋，明又不及元。”^{〔1〕}就史学思想来说，元代史学思想显示出开阔气象，明前期却是少了这等胸襟。刘基的《春秋明经》系统宣扬华夷之势不两立的观点，非常狭隘，是一个典型。

明代初期，朱学一统天下，《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全》之类抄袭出来的平庸作品，却是士子必读之书，败坏了社会风气。顾炎武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十族诛而臣节变，洪武、永乐之间，亦世道升降之一会矣。”^{〔2〕}最后一件是说方孝孺的事。明前期史学思想是“苍白”的。^{〔3〕}

〔1〕 皮锡瑞著，周予同注：《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1959 年版，第 283 页。

〔2〕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书传会选》，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页一三九〇。

〔3〕 白寿彝先生说：“如果说，从明初到嘉靖以前，也可以算作一个历史阶段，这个阶段，是明清史学的一段比较苍白的阶段。”（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79 页。）



明代前期的史学思想不能与元合为一卷，又不能单独成卷。把明代史学思想前期与后期作为一个整体，则可以看出思想流变、发展。

明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老时期，“我们说它衰老，不说它是解体，就是说它已经失去了旺盛的生命力，但生命力还是有的，甚至还相当顽强。这种特点反映在史学上，一方面是因循保守气息的充斥，另一方面，是反映时代抗议精神的优秀作品在不断地问世”^[1]。也正是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有明一代史学的风貌。

学术思潮衍变带来史学思想变化。吴与弼（康斋）、薛瑄（河东）承朱学，至陈献章（白沙），“独开门户，超然不凡”^[2]。白沙一折，是为王守仁（阳明）之学。王学兴起后，形成浙中王门、江右王门、南中王门、楚中王门、北方王门与粤闽王门。众多王门中唯江右王门得其传。阳明之学影响学术、影响史学，体现出一种生动的精神。泰州学派兴起，“坏”了王学，其“狂放”的议论，显示出思想上的活跃。“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亦因泰州、龙溪而渐失其传。”^[3]泰州后，颜山农（钧）、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李贽（卓吾）则被视为名教的“异端”。

学术变化对史学产生的影响，可以举出几点来。一、批判思潮的兴起，从新的视角对历史进行总结。二、朱学的教条受到挑战，对历史的认识与评价发生变化。三、对践履观新的阐释，为学术经世提供了思想上的说明。刘宗周“慎独”说之发明，影响下及有清的史学，由黄宗羲“而开万氏弟兄经史之学”^[4]。四、史学思想活跃带来史学上的进步，出现一批改写宋史的史书和纪事本末体史书，这些史书编纂的立意之一，是为观察盛衰；笔记野史以及地方志的编写，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对前代史书的评论和对《史通》的整理研究，成就也相当可观。

明后期的史学，为明末清初史学思想大升华做了铺垫。

有明一代的学术、学风也存在问题，顾炎武批评相当凌厉。^[5]从整

[1] 白寿彝主编：《中国史学史》第一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2] 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案》。

[4]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卷五《浙东学术》，中华书局1985年版。

[5] 参见《日知录集释》卷十八《窃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体上说，相对于其他朝代，明代史学思想缺少力度，其弊也“浮”。

本卷写出有明一代的史学发展走势，而落墨的重点在阐述明代后期的启蒙思潮、经世思潮、黜虚征实思潮，潮涨潮落，景象万千。善读者当心知其意矣。

目 录

题 记 / 1

导 言 / 1

第 一 编

第一章 明前期政治、文化发展特点与史学思想 / 15

第一节 明代前期政治、文化专制的强化 / 15

第二节 三部“大全”的编纂与明前期学术思想的格局 / 22

第三节 明前期史学与史学思想的特点 / 27

第二章 宋濂的史学思想与学术评论 / 33

第一节 宋濂的学术渊源及特点 / 35

第二节 宋濂的史学思想 / 39

第三节 宋濂的六经观和诸子考辨 / 50

附 方孝孺的正统论及其影响 / 59

第三章 王祿的史学思想 / 69

第一节 王祿的史学实践与史学观念 / 70

第二节 王祿的正统观 / 79

第三节 《大事记续编》的撰述及思想 / 83

第四章 丘濬的正统观与历史观 / 91

第一节 《世史正纲》与丘濬的正统史观 / 92

第二节 《大学衍义补》的历史思想 / 106

第 二 编

第五章 明代后期史学思潮的兴起与发展 / 127

第一节 明代后期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 / 127

第二节 文化及思想发展的新格局 / 130

第三节 史学思潮的主流及其相互关系 / 135

附考一 关于《史纲评要》《熙朝名臣实录》的作者及有关问题 / 150

附考二 万历时期朝廷打压有异端倾向的学者 / 151

第六章 陈建的经世史学思想 / 153

第一节 对理学史的认识和“究心学术邪正之分” / 154

第二节 “为当世借前箸筹之” / 162

第三节 《皇明资治通纪》史论的思想价值 / 167

第七章 薛应旂的史学思想 / 178

第一节 “所见出入朱陆之间”的理学特点 / 178

第二节 “经史一也”与“折衷汉宋” / 182

第三节 理学影响下的史学鉴戒思想 / 188

第四节 彰往察来与“时”“势” / 192

附考 关于薛应旂的生卒年 / 197

第八章 王世贞史学理论的贡献 / 198

第一节 “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 200

第二节 史学批评及其理论贡献 / 206

第三节 历史的评判与现实的批判 / 216

附考 关于《祝子罪知录》王世贞序的问题 / 225

第九章 李贽的历史批判与史学批判 / 227

第一节 李贽的思想形成与史著 / 228

第二节 李贽对历史运动的理论阐述 / 234

第三节 李贽历史批判的史学理论 / 240

第四节 李贽历史批判实践的思想特点 / 249

附 焦竑的学术特点与史学思想 / 259

附考一 明人对“道统论”的批判 / 272

附考二 明人对人生问题的思考 / 273

第十章 胡应麟的史学和历史文献学理论 / 275

第一节 胡应麟的学术特点及著述 / 275

第二节 胡应麟的史学理论 / 280

第三节 胡应麟的历史文献学理论 / 292

本卷主要引用书目 / 299

导 言

明代，从洪武元年（1368年）建鼎，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亡朝，先后长达270余年，是继秦、汉、隋、唐及元之后又一个统一的大皇朝，在中国历史上，不仅占有重要的政治地位，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和文化内容。在这270余年的历史进程中，先后出现过诸多富有时代意义、影响深远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包括：一、政治上建立了空前专制的君主集权制度；二、经济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萌芽；三、文化思想上产生了带有早期启蒙色彩的文化思潮。很难想象，在内容如此丰富的历史时期，尤其是在晚明社会新、旧因素矛盾冲突格外激烈的时期，会没有出现有价值的史学内容。不可否认，明代没有出现司马迁、司马光式的史学巨匠，也缺少体例成熟、编纂严谨的历史著述。但是诚如嵇文甫先生对晚明思想的评论：“你尽可以说它‘杂’，却决不能说它‘庸’；尽可以说它‘嚣张’，却决不能说它‘死板’；尽可以说它是‘乱世之音’，却决不能说它是‘衰世之音’。”^{〔1〕}即在当时表面庞杂粗疏的史学现象中却蕴含着新的史学思想。因此历史地看，明代的史学确实是在以新的特点继续向前发展着。

〔1〕 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第一章《从王阳明说起》，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明代史学的发展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史学著述繁富。明代社会教育的普及，社会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印刷出版业的长足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各阶层士人的史学撰述活动，从而留下了令人瞩目的繁富的史学著作。对于这一点，仅从《明史·艺文志》著录的图籍就可以看出。《明史·艺文志》的编纂受唐刘知幾《史通》相关理论的影响，仅收有明一代人的著述，其中史部分为十类，共著录了史书 1378 部 27547 卷。而《明史·艺文志》在定稿之前，曾经先后两次遭到删削，其中康熙三十三年至雍正元年（1694—1723 年）间，当时的史馆总纂王鸿绪，将原黄虞稷著录的 12000 余种图籍删削到 4000 余种，把所谓“无卷帙氏里可考者”和“书不甚著”者都删削掉，此后总裁张廷玉所进呈的《明史》中的《艺文志》，基本采用的就是王氏的成稿，很少改动。因此，明代实际上的史学著述要远远超过现《明史·艺文志》著录的数字，应不会太少于《宋史·艺文志》著录的数字，而《宋史·艺文志》所著录的书籍还包括了前代的作品。因此，明代史学著述的繁富是相当突出的。

第二，著述体裁、体例多样，发展承前启后。明代，尤其是晚明的史学，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说的“编纂方法只是因袭前代而无创新”。白寿彝先生把明末以后至今视为专史时期，^[1] 是非常有见地的，这实际已为晚明确定了在中国历史编纂学史上的地位。明代专史的发展相当突出，像职官制度史、经济史、思想学术史、军事史、边防史地，以及为某种社会政治目的编纂的专题文编等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著作。

明代史学在著述的体裁、体例方面，在继承的基础上所进行的创新，格外值得重视。例如自宋代袁枢改编《资治通鉴》创立纪事本末体以后，在长达 400 多年的历史中，虽然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但是除刊刻于宋宝祐元年（1253 年），流传不远的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外，一直没有类似体裁的著作问世。直到晚明，才有傅逊的《左传属事》“仿建安袁枢纪事本末之体，变编年为属事，事以题分，题以国分，传文之

[1] 参见《白寿彝史学论集》下《中国历史体裁的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658 页。

后，各隐括大意而论之”^{〔1〕}。继而是刊刻于嘉靖末年高岱的《鸿猷录》，分专题记述和评论了嘉靖之前的明代军政大事，再后则是冯琦、陈邦瞻撰述的《宋史纪事本末》和陈邦瞻独撰的《元史纪事本末》。两书分别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万历三十五年刊刻，从而使这种“前后始末，一览了然”的体裁再现于史坛。以陈氏为主编纂的宋、元《纪事本末》，与袁枢《通鉴纪事本末》仅就《资治通鉴》一部“本有脉络可寻”的编年体史著剪裁成书不同，乃是通过剪裁多部、多种体裁的巨帙宋、元史书而成，故“其寻绎之功乃视枢为倍矣”^{〔2〕}。而且宋、元《纪事本末》涉及问题也较广泛，除政治事件外，如治河、茶盐、学术思想等皆有专题叙述，同时还记载了金和蒙古早期的历史情况，不仅扩大了纪事本末体的记事范围，更重要的是，它的创作，使纪事本末体真正成为以“事”为核心的史书体裁，标志着纪事本末体的成熟。因此，从历史编纂学的意义讲，宋、元《纪事本末》的编纂，是纪事本末体裁史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此外，明代纲目体裁的发展也具有同样的意义。

在思想学术史的编纂方面，明代学者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明代理学发达，“前代所不及”^{〔3〕}，从而极大地刺激了思想学术史的编纂。思想学术史性质的著作，自宋代的李心传《道命录》和朱熹《伊洛渊源录》开启撰述门径之后，直至明代才有大规模的发展，当时计有殷奎的《道学统绪图》，谢铎的《伊洛渊源续录》，宋端仪、薛应旂的《考亭渊源录》，林槿的《续朱子伊洛渊源录》，朱衡的《道南源委录》，薛甲的《心学渊源录》，胡直的《考亭渊源录》，陈阶的《道教渊源录》，郑良佐的《道学统宗内外二传》，江尚和的《紫阳道脉录》，金赅亨的《道南录》，刘元卿的《诸儒学案》和《儒宗考辑略》，王之士的《道学考源录》，杨范的《道统言行集》，陈云渠的《浙学谱》，刘长卿的《浙学心传》，王圻的《道统考》，冯从吾的《元儒考略》，周汝登的《圣学宗传》，徐奋鹏的《古今道脉》，刘宗周的《明道统录》等等，这说明从明代后期起，编纂思想学术史已成为一种史学传统，并为清初孙奇逢的《理学宗传》和黄

〔1〕 永裕等撰：《四库全书总目》卷二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

〔2〕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九。

〔3〕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发凡》。



宗羲《明儒学案》等学术史著作的编纂，以及思想学术史走向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代还是经世文集和地方志撰述的大发展时期，在此之前，所谓的经世文集只有南宋滕珙根据朱熹的语录、文集分类编纂的《经济文衡》等极少数的著作，而明代仅明确冠以“经世”或“经济”名目的史著就多达 20 余部，尤其是编纂于明末的《皇明经世文编》，规模宏大，目的鲜明，针对性强，对后世史学具有很大影响。

第三，史学思想活跃。这也是明代史学发展的重要表现。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衰老的转折时期，新旧矛盾的斗争异常激烈。商品经济的繁荣、王阳明心学的崛起，以及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深化等等，都对思想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不仅使得思想学术界逐渐摆脱沉闷，而且也使史学思想在这种思想氛围中渐渐地活跃了起来。明代史学发展的特点是私人修史发达，而私撰史著较之官修史书，一个很大的不同是思想活跃。新史学思想的光芒和新、旧史学思想的交锋，无一不是在那些私撰的史著和各种文集中展现的。当时，历史的是与非之辨、情与欲之辨、公与私之辨、道德与事功之辨、经与史关系之辨、经与权之辨、时与势之辨、改革与保守之辨等等一系列有关历史运动、历史动力、历史伦理、历史与现实的历史理论、史学理论问题都在史学中受到广泛的关注，有的还讨论得相当深入，为史学史留下了丰富的史学思想遗产。谢国桢先生曾经说：“拿清代考据学家的尺度来衡量明代的学风，明代的学术思想自然是有时过于疏略；可是拿明代学术思想的放达和记载朝野逸事的丰富来比较衡量，清代考据学家的末流，羌无故实、不关痛痒的繁琐考证，那不更显得索然寡味吗？”^{〔1〕} 谢国桢先生的论述，说明了明代史学思想活跃是史学发展的重要表现。

当然，明代史学思想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它在中国史学思想发展历程中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我们说，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明清之际无疑是个史学思想高峰，而这个高峰与明代史学思想的发展，从思想本身到学术的表现形式，都有着直接的联系。阅读明代，尤其是明后期史学思想的文献，我们就会发现，当明清之际的史学

〔1〕 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0 页。

家、思想家在展开他们犀利的思想批判、政治批判和学术批判的时候，实际也正是在发展着明后期兴起的启蒙史学思潮、经世史学思潮和黜虚征实史学思潮的史学思想。也正是在这些思潮发展的基础上，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史学家才把中国的史学及思想推向它的新高度。

明代史学思想与明清之际史学思想的联系，可以从这样几方面看出：

其一，明清之际的社会政治批判，是对明后期兴起的启蒙史学思潮中社会批判的深化。从明后期到明清之际，社会政治批判的思想发展，表现为从对自然人性私欲的肯定，到“天下人各各有欲，岂独人主”的诘问，再到对封建专制君主以一己之私害天下之大公的批判这样一个思想逐步深化的逻辑过程。

明清之际史学家、思想家批判封建专制政治的一个重要思想点，是强调全社会的公欲，否定封建君主一己的私欲；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私天下”，要求分权共治的“公天下”。如王夫之说：“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大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1〕}但是明清之际的史学家、思想家所谓的“公欲”，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在肯定人人有欲的认识基础上展开的。黄宗羲便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仁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2〕}顾炎武也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3〕}然而，沿着思想发展的逻辑寻绎，这种肯定自然人性“私欲”的思想，正是源自明后期的史学家、思想家。例如，被人称为“异端之尤”的李贽便明确地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4〕}李贽之后，吕坤进一步提

〔1〕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中华书局1975年版。按：顾炎武、黄宗羲均提出过类似的观点。

〔2〕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中华书局1981年版，页一。

〔3〕 顾炎武：《日知录集释》卷三《言私其戮》条，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120页。

〔4〕 李贽：《藏书》卷三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